

解放战争时期的儿童团——

烽火中那抹少年红

■孙 形 朱灵茜

六座丰碑

■于群

图文军史馆

到“红都”江西瑞金，很多人会去参观中央苏区“六大建筑”，感受红色文化。“六大建筑”分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红军烈士纪念馆、红军烈士纪念亭、红军检阅台、公路亭和博生堡。“六大建筑”是由我党隐蔽战线的杰出代表钱壮飞担纲设计，许多建筑细节藏着我党我军对抗顽敌的斗争智慧。

在瑞金沙洲坝，坐落着中央苏区“六大建筑”之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钱壮飞过人的设计天赋在大礼堂的建设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大礼堂从空中俯视，宛若扣在大地上的红军八角帽。礼堂内部，八角造型搭配双层结构，空间宽敞开阔，可容纳2000余人。他在礼堂内设计修建了17扇门、41扇窗，使其不仅便于采光，更有利于在敌机来袭时，参会人员从就近的门窗紧急疏散。

独特的声场设计，使得礼堂内部回音效果很好。台上的人即使不用麦克风，台下的人也可以清晰听到台上的讲话。参会者不管是在二层还是在一层，都没有遮挡地看到舞台中央。

在最初选址和设计时，钱壮飞等人首要考虑的是安全问题。这座大礼堂是专门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而建的。出于安全考虑，大礼堂选址在沙洲坝长有茂盛树林的地方，从礼堂后侧可直接通向约10米外的配套建筑——防空洞。

防空洞可容纳2000多人，通道宽度可供两人并行，“回”字形工事设计便于身处不同位置人员快速疏散。防空洞内部还有许多通风口，确保空气通畅。今天，防空洞被当地用作防空演习，继续发挥着作用。

距离大礼堂约11公里的瑞金市叶坪镇，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诞生地，其他5座建筑坐落于此。钱壮飞在设计时，用建筑造型暗合了一组数字序列：红军烈士纪念馆，竖着看像数字“1”；红军检阅台的横梁组合像“二”字；公路亭是三角形造型；博生堡从上方看是四四方方的正方形；红军烈士纪念亭是五角星造型。

红军检阅台为砖木结构，悬山顶，占地78平方米，见证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次阅兵。1931年的11月7日清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正式举行阅兵典礼，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项英、任弼时等同志站在检阅台上，向受阅部队挥手致意。

这场意义非凡的阅兵，是在敌人封锁环境中举行的。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组织者将阅兵选在早晨时段，并在距离叶坪约40公里的长汀，设计了一个假会场。国民党军10余架飞机飞到瑞金时没有发现异样，在长汀上空则看到了一个张灯结彩、红旗飘展的会场，认定那是举行重要活动的地方，投掷百余枚对假会场进行了轰炸。而位于瑞金叶坪的检阅现场没有受到大的影响。

红军烈士纪念馆塔位于叶坪红军广场的中心。它造型独特，塔身似一枚蓄势待发的炮弹，象征着红军烈士们冲锋陷阵、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塔身镶嵌的一颗颗小石子，代表着一位位红军烈士。塔身周围镶嵌着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题词。塔前地面上，鹅卵石铺成的8个大字格外醒目——“踏着先烈血迹前进”。

在物资匮乏、战火纷飞的年代，苏区军民捐钱捐物、出人出力，在敌人的炮火封锁下，建成了承载革命信仰的红军烈士纪念馆。后来，纪念馆被国民党军炸毁后，苏区的一位大娘专门跑到纪念馆的废墟前，冒着雨寻找建筑残骸。她发现有一个完整的“烈”字碑，就冒着危险把它带回了家。为了不让人发现，她将其反过来盖在鸡窝里面，到1955年重建纪念馆时，才将其捐献出来。人们今天看到的红军烈士纪念馆上，“烈”字是原迹。

在物资匮乏、战火纷飞的年代，苏区军民捐钱捐物、出人出力，在敌人的炮火封锁下，建成了承载革命信仰的红军烈士纪念馆。后来，纪念馆被国民党军炸毁后，苏区的一位大娘专门跑到纪念馆的废墟前，冒着雨寻找建筑残骸。她发现有一个完整的“烈”字碑，就冒着危险把它带回了家。为了不让人发现，她将其反过来盖在鸡窝里面，到1955年重建纪念馆时，才将其捐献出来。人们今天看到的红军烈士纪念馆上，“烈”字是原迹。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航拍。

孙振荣摄

结》中这样写道：“地下少先队为最活跃宣传力量，传单散布量占全市地下宣传品60%以上。”

解放战争时期，儿童团在后勤支援上，也是竭尽所能。兆麟儿童团的团员们积极募集物资，把自己家中仅有的粮食、野菜省下来给解放军。他们还站岗放哨，帮助军烈属转移、隐藏粮食物资，全力支援解放军官兵。福建永春东平儿童团团员协助地下党传递情报、张贴标语、开展反霸斗争等。这些少年以力所能及的行动，构筑起敌后后勤与安全的坚固防线。

烽火岁月里，无数少年英雄献出年轻生命，用热血践行对革命的忠诚，用生命守护崇高的信仰。少年英雄谢荣策，1931年生于辽宁辽中，1947年任茨榆坨村儿童团团长，带领儿童团员侦察敌情、传递情报。1948年3月，国民党军骑兵突袭村庄，他为了掩护群众和干部撤离，不幸被捕。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谢荣策坚贞不屈，怒斥敌人罪行，始终坚守革命秘密，最终慷慨就义。少年英烈林森火，1933年生于浙江玉环，1948年担任坎门地下儿童团团长，经常奔走传递情报、散发革命传单、探察敌军动向。1950年11月20日，盘踞披山岛的国民党军700余人在3艘炮艇掩护下，偷袭坎门。林森火主动奔赴前线为解放军运送弹药，又前往山脚炊事房为官兵烧水做饭，不幸被敌军炮弹击中，壮烈牺牲。还有岳云贵、王璞等一众少年英雄，面对敌人的冰冷屠刀毫不畏惧，坚守气节从容赴死。少年英烈的热血浸染故土，浇灌出人民解放的胜利花朵。

我们将永远铭记，曾经有这样一群少年，他们以单薄身躯扛起家国重任，以赤诚热血映照华夏山河。那抹在烽火中高高飘扬的红，是少年们的信仰底色，更是中国革命的希望之光。



1947年，东北某地儿童团员在站岗。

资料图片

割草、拾柴、放牛羊的样子，悄悄潜入国民党军碉堡、据点附近，观察其兵力部署、武器装备、岗哨轮换等，再将情况传递给武工队。他们沉稳机敏，面对敌人的盘问，总能用巧妙的话语掩饰过去。1947年秋，孟良崮战役期间，沂蒙山区国民党军与还乡团密谋深夜偷袭武工队。儿童团员白俊生借着讨饭名义，趴在还乡团驻地窗外偷听，获取敌人进攻时间、路线与兵力部署。他连夜翻山15里，在国民党军行动前将情报送达武工队，使队伍安全转移，避免遭受毁灭性“围剿”。

当时，国民党军队对游击根据地实行经济、交通封锁，切断了武工队与外界的联系，使药品、文件、弹药、情报的传输变得极为艰难。传送情报与文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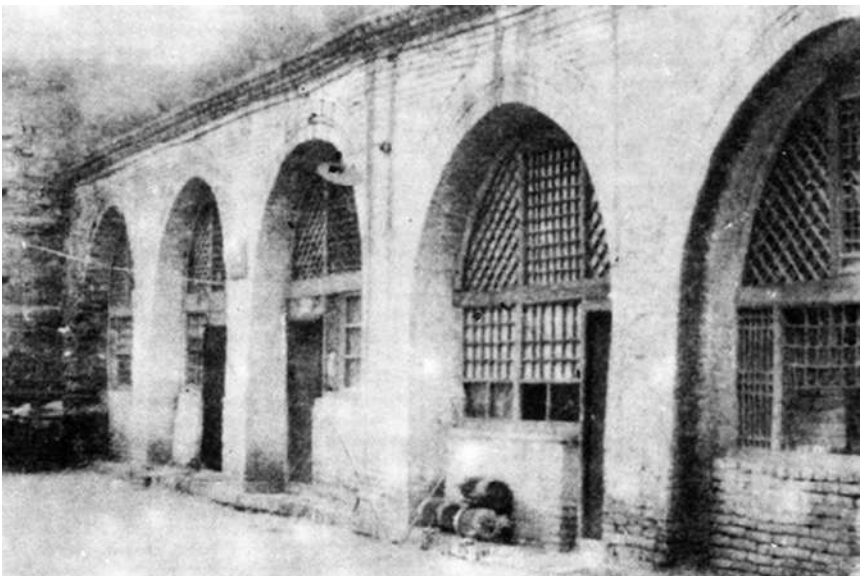
的危险工作落在了儿童团员的肩上。这群“生于斯长于斯”的少年儿童，熟悉家乡的羊肠小道、山洞地窖、芦苇荡，知道如何避开敌人的岗哨与巡逻队，巧妙地把密信藏在头发、鞋底、竹竿、野菜筐夹层等处，勇敢地穿越封锁沟和炮楼。他们用瘦弱的身躯，在敌人封锁网中开辟出一条隐秘交通线，让革命指令在黑暗中得以传递。

各地儿童团员还组建少年宣传小队，抓住一切可行时机，在大街小巷张贴革命标语。在上海，报童学校党支部油印了300份《告上海市民书》传单，组织“报童近卫军”以卖报、送报为掩护，向市民派发，还广泛张贴“欢迎解放军”的标语，动员青年学生、工人投身革命。上海地下党1948年《宣传工作总

90年前的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举行第一期学员开学典礼——

应时而生为抗战

■武建奎 倪 帅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校址。

资料图片

盾成为主要矛盾，中国的政治形势正处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转变时期。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提出必须大量地培养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1936年5月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延长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瓦窑堡创办一所红军大学。于是，在形势任务紧要关头，为培养干部、造就人才，迎接伟大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到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诞生了。

斯诺参观访问红大时，该校刚由瓦窑堡搬迁到保安。开学典礼后不久，因瓦窑堡遭到国民党军袭击，红大便随同中央机关撤出，7月初搬迁到保安县办学。红大第一期学员约1065人，主要来自中央红军和红15军团。全校学员编为3个科，第一科是高级科，主要训练师团以上干部，全科共40人，其中红军师、团以上干部38人，平均年龄27岁；第二科是上级科，主要训练连、营干部，全科共225人，分为2个队；第三科是普通科，主要训练连、排干部和部分老战士，全科共800人，编成6个队。

红大着力培养学员的政治和军事素养。第一、第二科教学课程基本以军事与政治并重，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克

思列宁主义、军事战略学等内容。毛泽东讲授的战略学尤为吸引学员。他为第一科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讲演，对学员教育启发很大。斯诺在了解红大的课程后说：对于“红军真的要打日本吗”这个问题，红大的这些课程也许是个很好的答复。这足以说明红军早已预见到而且在积极计划中国如何对日本打一场“独立战争”。

理想之光催生精神力量。红大学员们克服物质条件的艰苦，全身心投入学习。毛泽东在开学之初就告诫学员，红大的状况是“四个没有”：要教员，没有；要房子，没有；要教材，没有；要经费，没有；怎么办？就是要艰苦奋斗。在参观红大第一科位于保安的校舍时，毛泽东说：红大学员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着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

当时，红大学员不管职务高低，人人动手，就地取材，把小石洞作卧室，较大的石洞作讲堂，砌起石讲台和石凳，以石壁当黑板，以膝盖当课桌。他们晴天在大树下露天上课，雨天搬进石洞课堂。条件虽然艰苦，但学员们的学习热情和自觉性都很高。红大第一科学员莫文骅在日记中写道：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准备迎接抗日高潮到来吧。忘我的学习也使

军史文苑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大肆修筑碉堡据点，构建层层封锁线，推行严苛残暴的保甲制度，疯狂搜捕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危难局势下，儿童团员凭借行动灵活、不易引人戒备的优势，成为敌后革命斗争中的特殊力量。他们年龄最小的八九岁，最大的十五六岁，穿梭于碉堡封锁线间，奔走在山林街巷中，以稚嫩的肩膀扛起侦察、通信、宣传、支前的重任，谱写了一曲热血报国的少年壮歌。

1946年6月，解放战争开始后，遵照党中央革命工作部署，全国各地迅速整顿重建少年革命组织。广大乡村全面组建基层儿童团，国统区秘密成立地下少年先锋队。报童近卫军、铁木儿团、少年铁血队等各类少年革命团体相继涌现。这些队伍规模大小不一，小至由三五人组成的秘密行动小组，大到整村、整街道的建制队伍，统一由中共地下党组织、敌后武工队、青年联合会直接领导，实行单线联络、秘密活动。《哈尔滨市儿童团简章》中记载，哈尔滨特别市儿童团（后改名兆麟儿童团）宗旨为“团结广大儿童，提高爱国思想，服务新民主主义社会”，人团年龄9至16岁，由中共中央东北局青年工作委员会直接指导。1946年《胶东区牙前县长沙区儿童团工作总结》中写道，团员成分涵盖贫农、中农、雇工子弟，活动以侦察、送信、支前为主。这些档案充分证明，解放战争时期的儿童团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正式革命组织，而非零散自发群体。

侦察敌情，是儿童团最重要、最危险的任务。孩子们是“眼睛”，是“耳朵”，是守护根据地的一道防线。在沂蒙山区、晋绥边区、陕甘宁边区等地，儿童团员们每天天不亮就走出家门，装作

军史回眸



1936年7月，美国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在陕西保安参观了一所大学，评价这所大学有许多独一无二的地方：这所大学有一个班的学员平均年龄虽然只有27岁，但平均每人有8年作战经验、受过3次伤。由于缺乏纸张，学员们学习时把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作课堂笔记本。这所大学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校舍不怕轰炸。像这样的大学，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么一所。

斯诺参观的这所大学，就是红军最高军事学府——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

1936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以下简称“红大”），在陕北瓦窑堡举行了第一期学员开学典礼。红大在孕育之初就与民族存亡、国家兴衰紧密联系。斯诺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把红大视为考察中国共产党人抗日情绪最合适不过的地方。

红大因抗日而生，为抗日而建。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同志指出：我党创办抗日红军大学，是为准备迎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他鼓励全体学员：红大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中成为主导力量。毛泽东的讲话为红大点亮了理想之光，注入了精神之魂，将红大的办学指向了抗日救国，把办学目的与任务指向了培养大批抗日革命人才。

理想源于现实。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继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武力侵占我东北之后，又将魔爪伸向华北，妄图吞并华北进而吞并全中国。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步步退让。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经过艰苦的长征刚抵达陕北，红二、红四方面军还在长征路上。此时，国民党军队坚持对红军进行“围剿”，集中力量进攻我红军和陕北根据地，妄图在我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立足未稳之时，一举将红军消灭。

在民族危亡之际，虽然仍遭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处境艰难，但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地认识到，民族矛盾已经超越阶级矛